

习仲勋与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

□ 黄拴铨

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的创建,首先是在部队中举办各种训练班(队),其后发展为创办较为正规的红军干部学校和随营学校。

1931年10月20日,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杨重远领导的陕北支队在南梁林锦庙(今华池县林镇)会师后,来到正宁县东北的月明塬柴桥子村,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1932年1月1日,谢子长同志一起将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为了教育训练这支成分复杂的队伍,在部队中临时开办军政训练班,组织班、排干部进行游击战术训练和军队政治思想教育。1932年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委员会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大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之后,谢子长等领导认真总结了以往开办军政训练班的经验,又在游击队中创办了军政训练队,主要培训对象为排级以上干部、班长以及优秀战士。在教学中坚持政治教育、思想建设与军事教育相结合,并进行游击战术等军事技术训练。军政训练队队长由张从(留苏学生)担任。训练队分两个班,高级班训练排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及部分优秀战士。课程有“游击队怎样活动”等,同时学习刘志丹为红军起草的《简明军纪》《群众纪律》两个小册子,还讨论部队改编等问题。军政训练队1932年夏结束。1932年12月24日,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团)。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适应整军和扩军任务需要,红二十六军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开始进行正规红军的教育和训练,以提高部队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参谋长郑毅在1933年1月9日写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说:“关于训练的材料(军事的与政治的)与教授人才,非常缺乏,这是要请你们火速派人来和送教育材料来的。”

早在红二团成立前,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就几次指示陕甘游击队,在部队中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以及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各级干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省委的报告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

边新苏区的决议》第三条指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即刻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为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组建不久,在刘志丹领导与关怀下,1933年1月在照金根据地创办了陕甘红色政权所属的一所红军随营学校。李杰夫任校长,汪锋兼任政委。刘志丹亲自编写教材并为学员做报告、讲课。由于当时处于险恶斗争环境之中,随营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是一种“游击学校”。教学形式采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教学内容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安排。6月间,随营学校因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失败而停办,短短6个月时间共培训学员200余名,使红二十六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得到较大提高。

1934年,在陕甘边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红色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部队和地方政权都迫切需要大批党政军骨干。急需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已成为当时军队教育的迫切任务。1934年10月,在刘志丹、习仲勋的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军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张家岔创办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根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问题。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六大决定”(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内容,旨在使学员懂得红军的性质、任务及其远大目标;文化课因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以识字扫盲为主,提高文化水平;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主要掌握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提高指挥作战能力。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一次,刘志丹正在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前来检查工作,刘志丹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并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要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并欢迎习仲勋给大家讲话。习仲勋一向把刘志丹当作领导者,论年龄刘志丹比习仲勋长10岁。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不知如何是好。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

说:“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从此,20岁的习仲勋更受到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习仲勋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重他。学员对象,有来自部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少量的地方干部。教学没有正规教室,每个学员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做笔记,教员在台前或黑板上写,学员做笔记。学校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当时,大家叫它“黄米杠子”,偶然在改善伙食时也能吃到一点羊肉。干部学校每期学员百余人,从1934年到1935年春,共办了三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或赤卫队工作。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为很有才干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改建为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的地方干部,办了为期两期培训班,前后共培训干部200多人。1935年7月,陕甘边区党政干部学校迁至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瀛,教育长张文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中央军委决定将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即原中央红军干部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毛泽东兼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1937年初,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刘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在红军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舒宗侨主编

抗战烽火中的《联合画报》

□ 王小梅

舒宗侨(1913—2007),生于江苏南京,是国内著名的老摄影家,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老年摄影学会理事,上海老年摄影学会主任委员,上海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等职。由于他开创了复旦大学新闻摄影教育和在摄影事业上卓著贡献,国务院从1992年起,颁以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英国剑桥传奇中心将舒宗侨收入1993年《世界名人录》和《世界知名人士人名录》。国内若干名人辞典也载入他的名字和事迹。

1941年,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战时图片宣传机构“联合国幻灯供应社”,邀请舒宗侨创办一份为同盟国宣传的《联合画报》,由美国新闻处温福立博士领头,舒宗侨担任主编并负责发行工作。起初借重庆南岸玄坛庙中央电影场楼下一间地下室工作,主办单位名称为“联合国幻灯供应社”。

《联合画报》初办时,每周一期四开张,人员只有二三人,发行量也只三四千份,后来增加到四五万份,职工增至10多人。舒宗侨一直担任主编。

20世纪40年代初,在大后方物资短缺、交通困难、机制纸张无法获得的情况下,要出版数量大的画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敌机轰炸,常常断电,这在制版、印刷以及运输上都带来麻烦。为了使前方战士也能看到画报,凡是有盟军的地方,《联合画报》每期均送去若干份。那几年,《联合画报》社还把画报通过盟国飞机在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时,从空中撒向敌人后方,以动摇敌人军心,这种“心理战”,起到很大作用。

美国新闻处原属美国战时宣传机构“战时情报局”,战争一结束,美国决定取消“战时情报局”,将一切宣传工作交给美国驻外使馆文化参赞办理。美方与舒宗侨在上海签订《联合画报》转让协议书,写明为感谢舒宗侨对二次世界大战宣传工作所作的贡献。将《联合画报》以美金一元象征性的代价,让给舒宗侨继续经营,但不包括任何物质财产。1945年11月,重庆《联合画报》周刊停办,上海《联合画报》复刊号接着出版。

此后的《联合画报》,从原来的报纸型周刊改为杂志型月刊,10开本,每期20多页。内容主要为新闻照片和有关通讯、报导,每期有两页“漫画之页”,由漫画家张文元主编。1945—1946年,国内政治形势动荡,一般报纸不能登、不刊登的新闻,《联合画报》予以大量刊载。

《联合画报》由于战时在大后方建立了摄影通讯网,能刊载大量的新闻照片。因此,《联合画报》的信誉比起在后方时更高,除上海总社外,还在北平、南京设立办事处。在

言论上尽可能站在民主进步的前沿。

舒宗侨在抗战后期,就有两种打算:一是到上海继续出版《联合画报》,二是尽早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联合画报》在沪出版不久,就打出广告预订《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由于在大后方建立起来的信誉和在沪出版后给读者留下较好的印象,一下子就有数千人订阅。有了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就在1946年9月抗战胜利一周年时出版,历时不到一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还未出版,舒宗侨和曹聚仁又筹划编著出版以中国抗战史料为主的《中国抗战画史》,从发稿到1947年5月出版,也只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1948年,舒宗侨又两次去香港,在香港出版了《二次大战照片精华》画册。1948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在上海塘沽路、乍浦路上海市参议会,军事法庭开庭审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那天在法官石美瑜审判台上放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两本书,用以印证日本侵华军在南京以及各地的暴行。这些图片资料,解放后,在展览会上被大量展览、翻印和引用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两本画册,用了两千多张新闻照片,近两百幅地图共40余万文字。从1946—1948年,因为两画册有史料价值,解放前后在国内外自印和被盗印共有八版之多,总数至少有十万册。



一犁新雨破春耕

□ 郑学富

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附图)。仿古铜器扁壶形制,小口,直颈,扁圆腹,椭圆形圈足。颈部有两个透雕夔龙形耳,腹部两面开光内斗彩绘江南农耕小景。宋代诗人释智愚有诗云:“烟暖土膏民气动,一犁新雨破春耕。”

斗彩起源于明宣德时期,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瓷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有争奇斗艳之意。清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制作工艺非常精致,釉下青花的轮廓描绘细腻,填色精准,反映出当时瓷器绘画工匠的严谨。壶侧用青花勾纹饰,内填矾红色花卉,间绘蝙蝠、莲花、如意、万寿、编磬图案,寓意为家园长庆、福增寿长、吉庆如意。底部写青花“大清乾隆年制”款。该器物为清代斗彩精品,题材在官窑瓷器中十分罕见,造型精美,色彩艳丽,图案新颖,是乾隆官窑中的绝妙之作。

《耕织图》最早为南宋时的楼璘所绘。他在任于潜县令时,跑遍了于潜县治十二乡之周边乡村,深入田头地头,出入农家,与当地有经验技术的农夫蚕妇研讨种田、植桑、织帛等经验技术得失,绘制出《耕织图》45幅,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幅。《耕织图》描绘细致入微又富有艺术感



染力,为研究农业特别是农具留下了无法从文字资料中得到的珍贵资料。他将图呈献给高宗,得到高宗赞赏和召见,并将《耕织图》宣示后官,获得吴皇后题词,一时朝野传诵,从而引发了“耕织图”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意外得获《耕

织图》,感慨织女之寒、农夫之苦,遂命内廷供奉焦秉贞以楼璘原作为基础重绘《耕织图》。康熙不仅每图亲题七言律诗一首,且于图前亲书序文,并于序首,序尾盖印。其后,乾隆帝又收集和翻刻《耕织图》,该图的摹刻之风和推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二次高潮。《耕织图》不仅出现多种翻刻版本,而且还被移植到其他艺术之中。如在瓷器彩绘中,《耕织图》成为一种特殊题材和特有纹饰,多用青花或五彩表现,采用中西相参的画法,精美非凡。

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两面各绘耕地和耙耨两个场景。如“耙耨图”中,农夫头戴斗笠,立于耙上,执鞭催牛,叱牛牵引,正在一片水田里耙地。田边坡地起伏,青草萋萋,鲜花盛开,树木葱绿。空中祥云飘飘。近处两棵绿树挺拔,田埂上站立一只家犬,正在观看主人劳作,平添了几分生活情趣。从图可见正值江南春寒料峭、春雨绵绵的时节,农民为不误农时,栉风沐雨,坚持耕作,稼穡艰难可想而知。康熙帝曾为“耙耨图”题诗云:“每当吁食念民依,南亩三时愿不违。已见深耕还易耨,绿蓑青笠雨霏霏。”

境内的考古发现

□ 潘頌珍

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洮河流域的一、二级台地上就有初民居住,形成氏族村落,“一般都选择避风向阳、近靠大山,下临溪水,有利于农业和渔猎的地方。当时村庄已有一定的布局,常常由居住区、窑场河公共墓地三个部分组成。”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基督教艾牧师在今西寨镇刘家堡半山腰的洞穴(三三洞)里发现了远古人类生活的遗迹:石坑、石锅、石台。

1947—1948年,民国中央地质调查所委派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1904—1982)赴西北地区进行地质、考古调查。裴文中等人在陕西汉水流域,甘肃渭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93处之多。“民国36年(1947年)9月,裴文中教授率兰州大学部分学生考察洮河流域时,在岷县茶埠镇山那等地发现‘仰韶文化’遗址。”裴文中教授在岷县洮河流域考察发现的彩陶文化遗址有山那树扎遗址、葩地坪遗址和叠藏河流域的中堡遗址等。

山那树扎遗址:位于县城北10公里茶埠

镇洮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西靠树扎、山那二村,东为洮河西岸,南为将台小学,北临干沟。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文化层距地表0.5—3米,地表有丰富的彩陶、红陶、灰陶及夹砂陶器残片,并有少数蛙纹、变体鸟纹图案,有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三种类型,亦有寺洼类型陶器出土。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配合兰渝铁路建设,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铁路穿越的山那、树扎遗址部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3183件。该遗址包含仰韶文化中期、晚期和马家窑文化三种文化因素,为研究洮河流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



葩地坪遗址:位于中寨镇葩地坪村二级台地上,遗址西为中寨镇政府,南为竹子沟,东为骨堆山,西北为中寨河,南北宽约200米,东西长约500米,地表为耕地和村庄。出土文物有马家窑类型火焰纹彩陶罐、红陶瓶和粗绳纹夹砂陶罐,北边有较多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墓葬。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堡遗址:位于岷县县城以南秦许乡中堡村台地上,距西河(洮河)约1000米,距南河(藏河)500米。曾出土过绳纹灰陶罐和罐盖,瓦径60×70厘米。198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裴文中以及后来的岷县文化馆考古工作人员还在茶埠镇姚庄,梅川镇杏林村马莲坪、西坝,西山镇草滩,中寨镇马崖、红崖、白塔山和维新镇草坪、坪上等地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



姚庄遗址:位于茶埠镇姚庄(姚庄应为窑庄之误写,因古时候擅有彩陶窑而得名)西南100米处。黄土断层中有不少泥质红陶随葬品出土。198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崖遗址:位于中寨镇红崖村,东依红崖村,南临洮河,西为马崖沟,北为太平山。地表有丰富的彩陶片、红陶片及汉代绳纹瓦片,有完整的陶器出土。198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